



找记者 上壹点

A11-12

齐鲁晚报

2020年11月12日 星期四

思想之光 华文字魅力

美编：李皓冰

【文化观】

千年木塔“病歪歪” 何时才能“永镇金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向阳

近日,位于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木塔,因为已经扭曲的塔体一直没有被修正,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这座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的木塔,历经千年的自然灾害与战争,已经出现扭曲变形。据媒体报道,自20世纪90年代初木塔修缮正式立项以来,修缮方案“难产”近30年。修缮方案“难产”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方案难还是决策难?网络上的声音各有主张。

应县木塔与法国埃菲尔铁塔、意大利比萨斜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可谓是座“宝塔”。应县木塔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高层宝塔,属于稀世珍宝、全国孤例。它巍然耸立在晋北广袤的大地上,有20多层楼高,平面八角形,明五暗四共九层,外观五层六檐,底层重檐出挑深远。全塔有50余种斗拱装点,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莲花,每一明层中心供奉佛像。登塔观览,桑干似带,恒岳如屏。应县木塔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的一座可登临的木构楼阁式建筑,也是现存唯一的一座真正具有多层使用空间的古代木结构佛塔。1974年塔内曾发现失传已久的契丹藏残卷,以及佛牙舍利、夹纻佛像等珍贵文物,轰动中外。当年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称赞:“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这座木塔是榫卯结构的代表性建筑,就是这样的建筑结构方式保证了木塔历经风吹雨打近千年。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人伊东忠太曾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这样对比应县木塔与日本的木塔:斗拱之制变化之多源自匠匠之丰富,这与日本那种千篇一律,每一层都使用相同斗拱的手法相比,孰优孰劣自不待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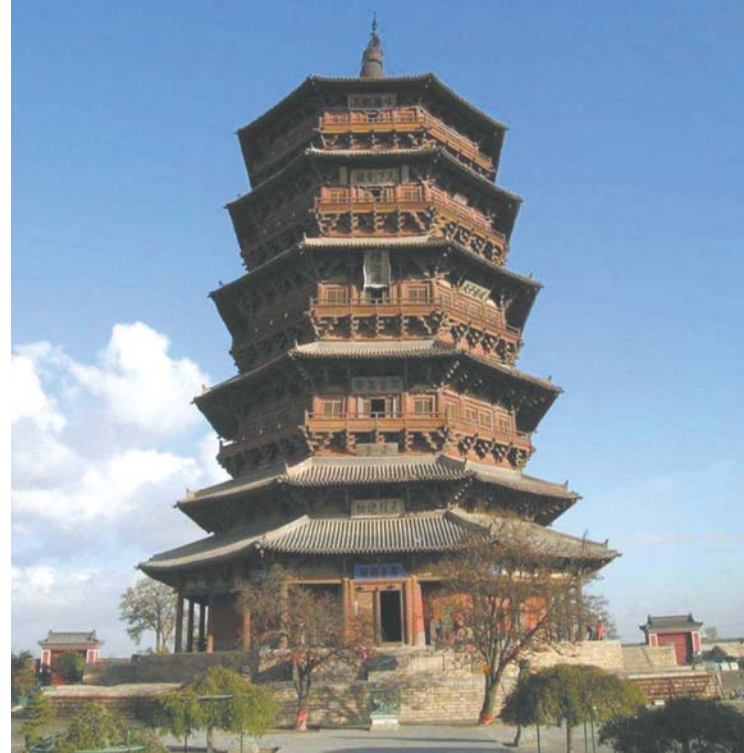
尽管应县木塔屹立不倒,但历经了千年风雨也是伤痕累累。因为是木结构建筑,木料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腐烂、变形,木塔所处的地区在史上曾发生过十多次大地震,而且应县也经过多次战火洗礼,在

上世纪30年代军阀混战时,数百发子弹和多发炮弹曾打入木塔造成损坏。尤其是二十世纪30年代,有些当地士绅嫌玲珑宝塔不玲珑,破坏了风水,擅自修缮,结果木塔二到五层的夹泥墙被人为拆除,对木塔结构产生了严重影响。梁思成痛惜再三,称其为“木塔八百年来最大的厄运”。在这十多年后,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莫宗江再次探访木塔时,发现它已扭转、倾斜,部分构件脱榫、劈裂。这证实了梁思成当年的忧虑。

从那时候算来,木塔“扭曲变形”至少70多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文物局曾组织专家进行抢险加固,但没能阻挡住木塔继续变形。从1999年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成立至2004年,相关文物部门先后邀请50余位专家现场考察木塔,并委托23家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勘察设计公司,完成了40多项前期勘察项目,在此基础上,他们产生了“落架大修”“现状加固”“抬升修缮”“钢支架支撑”等方案,对于不同方案的利弊,各路专家争论不休,至今开不出“药方”来。

众所周知,对国宝级文物古建筑的大规模修复必须十分慎重,须通过严密的论证和审批。木塔修缮必须持科学慎重态度,这就要求在开展古建筑修缮工作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的问题给出相适应的方案,从而有效地修缮古建筑,让其继续保存下来。目前看,制约应县木塔修复的主要是技术复杂、难度大、风险大、投资较大这些问题,然而慎重归慎重,不能因为慎重而无所作为,或许一时没有万全之策,但再等下去拖下去宝塔会更加危险。在我们外行看来,这就像医生去抢救垂危病人,争分夺秒、用尽全力未必能挽回生命,但也总比“坐而论道”等万全之策要强啊!

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日前,“国家文物局”官方微博公众号刊发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应县木塔项目组的长文《峻极神功,永镇金城——应县木塔保护回顾与前



瞻》,对应县木塔的维修保护问题的背景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透露,这背后还有对千年国宝修复的慎重与长远规划。文章表示,2007年以前应县木塔维修加固方案的反复,除保护理念的差异外,主因还是应县木塔异常复杂,保护修缮难度极大,受限于学科发展水平,基础研究不足。2014年,国家文物局原则同意《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及严重残损构件加固方案》,实施中经过图纸深化、试验性施工,以及专家提议、现场暂停等一系列过程,2017年以来该方案实施正在优化之中。应县木塔中期目标及主要工作(2030年前),通过持续开展结构监测、残损构件现状修缮,优化防灾预案等,消除一定时期内木塔局部或整体坍塌风险,为达到远期目标(即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全面修缮)争取时间。

应县木塔为何难维修,它独特之处在哪里?据专家分析,“中国古建筑自周秦以来,高层巨构代不乏出。但唐代以前除木方叠垒的井干楼之类以外,均是夯土台为中心外附木构的形式。汉晋隋唐以来所建之明堂与南北各地佛塔,即便没有夯土芯台也会设置中央贯通上下的巨木以解决抗侧力和塔刹承重问题,如日本现存之佛塔即保有此种做法。盛唐之后乃至五代宋初,高层木结构技术才最终成

熟,出现了主体木构建造,内部空间敞亮,没有中心柱遮挡的高层木结构,应县木塔就是其杰出代表与唯一留存下的实物。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元代之后,中国高层木构转变为另一种“通柱”的结构形式,而且再也没有达到可与应县木塔匹敌的层数与高度……”

应县木塔的结构体系的特点,根本地讲就是分层,把单层的殿堂式(按照北宋营建官书《营造法式》分类)建筑一层一层叠垒起来。这种分层是刚性层和柔性层相间布置,上下层柱采用“叉柱造”,且构件之间的榫卯都很简单,是一种积木叠置的思路,完全不是坊间传播的所谓现代“筒中筒”结构。

由此看来,这么一座被称为“中国古建筑的百代标程”的木塔,其维修难度和谨慎程度确实是超乎常人想象的。很多文物、古建筑专家学者几十年来已经默默为保护古塔做出许多工作和准备,虽然大家着急上火,迫切想尽早为宝塔解除“病痛”,但是也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期望应县木塔实施的科学保护措施与策略能获得社会各界最广泛的认同,在坚持文物保护“真实性”原则下,既可最大限度保存历史信息,又能让千岁木塔益寿延年;如同塔上悬挂的两块古代匾额颂诗的一样:“峻极神工”“永镇金城”!

□郑学富

【短史记】

明朝的户帖和黄册



明代黄册

11月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开启现场登记,普查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彻查人口出生变动情况以及房屋情况。

我国的人口统计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夏禹时。《史记》说:“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计民数就是统计人口。进入封建社会后,人口统计制度更完善,方法更科学,数据更准确。而明朝初年推行的户帖制度,是更加严谨和全面的人口统计,具有近代人口普查的雏形。官府所颁发的户帖即形同于现在的户口本。据悉,明朝的这次“人口普查”比美国(1790年)和英国(1801年)的“国情普查”早400多年。英国学者卡尔津曾撰文说:“此为全世界最早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大明王朝甫立,由于长年军阀混战,版籍俱损,流民覆野,百废待兴。如何构建完整的社会统治秩序,是明太祖朱元璋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连全国有多少人口都不知道,何谈管理国家、发展经济?洪武二年(1369年)末,朱元璋下令:“凡军、民、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忘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上谕中书省臣僚:“民,国之本。古者司民,岁终献民数于王,王拜受而藏诸天府,是民数有国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

朱元璋的户帖制,是受南直隶宁国府陈灌的启发。陈灌,字子将,庐陵人。他上任宁国知府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清豪强户口、田地数目,禁止土地兼并,从而使农民得到部分

土地,免除他们的疾苦。针对当时户籍极为混乱的情况,他发明了户帖制,在府内全面登记户口,每年核对一次。户帖制的实行,使得官府详细准确地掌握了民户的乡贯、人丁、产业等基本情况,便可以妥善地处理好户口、土地和赋役的问题。甫一推广,便受到宁国百姓的拥戴。

朱元璋得知后,认为此法甚好,于是下令在全国推广。明初推行户帖制度,其实是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过程。户帖的格式和调查项目由户部统一规定,统一印制,登记的项目有:户的种类、户主原籍、居住所在地、家里人数、年龄、性别、与户主的关系等。户帖有帖、籍两联,并于两联骑缝处写上编号、钤印,户部尚书、侍郎以次官员,事先在户帖上押名。印制好后,出具榜文,颁发给州县官府;户帖下达到地方州县后,由州县正官兼任提调官,提调州县勘合事宜。官员将辖区内百姓一一清点过目,按照户帖上所列项目一一认真填写,并押名。然后撕下籍联,将户帖交给各户收执;州县官吏回收完

户帖籍联后,朝廷派军队介入进行稽查。军士分赴各州县,下乡串户,持户帖籍联挨家挨户核对核实所填写的内容,如发现官员隐瞒现象,将处以极刑。比对结束后,将户帖籍联统一交给户部存档;朝廷规定,户帖每十年重新编造一次,州县官吏每年都要统计辖区内的户数人口。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实行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抑制豪强,减免税负等。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洪武之治已经显现,百姓安居乐业,朱元璋在户帖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黄册制度。黄册制度相比于户帖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徐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朝廷把居住在城乡的每个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

亩等逐一登记造册。每十年编造一次,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朝廷户部及省、府、县。因上报户部的册子封面是黄纸,故称为“黄册”。

朝廷视黄册为国家典籍,颇为重视。皇帝郊祀时,中书省吏员专门将黄册陈列于坛下,以示荐予上天,皇帝率百官行祭天大礼。礼毕,黄册贮藏于南京太平门外后湖(玄武湖)东西二库。

明代早期的黄册把人口分为三等:民籍、军籍、匠籍。民籍包括儒士、医生、阴阳卜士等。军籍有校尉、力士、弓手、舖兵等。匠籍包括厨役、裁缝、马船工匠等。另外,濒海地区盐户叫盐灶籍,佛教寺院有僧籍,道教观曰道士籍。明中后期,又增添官籍、商籍、先贤籍等。民户增有天地坛户、种树人户、坟户、光禄寺酒户、陵户、庙户、农户、瓜户、果户、米户、藕户、窑户、羊户、乐户等。凡各色人等均按从业类别登记户籍。人户以同姓著籍,禁止异姓合户。若有遗漏、脱户等,允许民户自行核实补报。《明实录》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载,“是岁,计天下人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

黄册制度既是明代的赋役之法,也是明代的户籍制度。成为明代社会经济方面重要的基本制度。黄册制度在明代广泛实行,并伴随明王朝的兴衰史。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共攒造了27次。据《后湖志》载,每次大造各地送南京户部后湖收贮的黄册多达200万余本,至明末,所贮历代黄册在200万本以上。然而,由于改朝换代和战乱频仍等原因,遗存的明代黄册文书,多是在乡里保存的黄册底籍、草册及抄底等。